

344

230

美帝國主義的政治與經濟

張志讓 陳翰笙
沈志遠 陶大鏞
等 著



新建設雜誌社出版

D11.204/19

★新學術小叢書★

2

美帝國主義的政治與經濟

張志讓·陳翰笙·沈志華·大鏞



美帝國主義的政治與經濟

新學術小叢書 2

作者：

張志讓
陶大鏞

陳翰笙

沈志遠

出版者：

新建設雜誌社

北京東華門南夾道六十二號

總經售：

全國各地新華書店

一九五二·五·二〇·初版（一一〇〇〇〇）

目次

美國政體的特性與現政府的軍事冒險性	張志讓 (一)
從經濟看美國政治	陳翰笙 (九)
論腐朽的垂死的美帝國主義	沈志遠 (一五)
美國財閥與美國侵略政策	陳翰笙 (二八)
論美國經濟上的弱點	陶大璠 (四〇)
帝國主義與侵略戰爭 (座談紀錄)	中國新經濟學研究會 葛建猷雜誌社 (四九)
後記	(七七)

美國政體的特性與現政府的軍事

冒險性

張志讓

以前德國和意大利的獨佔資本家要實行法西斯主義和發動世界大戰，必須抬出一個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建立一個納粹或法西斯政黨，並完全摧毀舊民主主義的議會制。今天美國却可以不必另找「領袖」，另建新黨，也不必變更其傳統的政體，而悄然走上法西斯軍事冒險的道路。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實，尤其因為美國的分權體制在某種意義上是與德意的獨裁體制相反的。同一體制，並未變更，它以前適應了舊民主主義的要求，現在又能適應法西斯主義的要求，美國政體的這一特性是我們要瞭解美國政治所必須研究說明的。

美國制定憲法之時，參加的人完全接受了孟德斯鳩的學說，主張三權分立並互相牽制均衡。他們將國家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完全分開，分別由國會、總統和最高法院行使。三個機關在其範圍之內各自獨立，彼此都沒有隸屬或控制的關係。這就是所謂「嚴格的三權分立」制，與英國式的三權分立有別。當時所舉的理由是必須這樣方足以「保障自由」（參閱「聯邦主義者」：第七章三權憲法與均衡制度——梅狄森）。然僅將三權分立，尚不足以確保其不侵越權限以流於立法專制或行政專制，故還必須有相互牽制均衡之制（參閱同上書第七章及以下各章）。其主要辦法就是：（一）總統以對法律案的要求覆議權來牽制國會。（二）國會以對總統任命國務員等和締結條約之同意權及彈劾權，來

牽制總統。(三)最高法院審判員由總統經參院同意任命，這是行政與立法牽制司法。國會對一般法院審判員的彈劾權是立法牽制司法。(四)最高法院確認某項法律爲違背憲法而不予執行的慣例是司法在事實上牽制立法和行政。當時制憲者所發表的用意是必須這樣方足以確保其所謂「自由」與「民主」。

可是這些制憲者所強調宣傳的中心要點自始就被一個陰生暗長的幕後勢力所變更——「嚴格分立的三權」一開始就被資產階級的政黨在幕後統一了起來。他們用三權分立和牽制均衡來預防的是一人專制，立法專制或行政專制。這些有形的專制確是沒有馬土實現，而美國人民却自始就遭受另一種無形的而却是更強大的專制，就是資產階級政黨的專制。資產階級的政黨自始就直接地或間接地，或多或少地控制了這彼此分立的三權。這三權的分立和制衡都變成了表面的，惟有資產階級政黨的統一和控制才是實在的。

到了獨佔資本全盛的時期，這兩套政治工具就都完全顯得陳舊不合用了——一套三權分立的政治機構和兩個分立的傳統政黨。這怎能與德國法西斯獨佔資本相比！他們有公開的法西斯政黨，有公開的法西斯領袖，而且沒有議會「清談館」的累贅。這是多麼靈便逞心的工具！

要如法泡製吧？緩不濟急，而且國內日益強大的人民力量也必須顧慮。要將就使用吧？工具的便利究竟是一個重要的條件。最好是找一捷徑，解決問題。這捷徑確是被他們找到了。

政黨是一個比較容易解決的問題。兩個政黨可以使它們用跑步追趕的方法而先後到達反動標旗樹立的線上。前年美國大選時兩黨公開的競選綱領已經沒有多大的區別，其實際行動更證實了它們的確是難兄難弟。兩黨內部成份反動程度的不一致，可以用加強反動領導來克服。領導本身的反動如有不

够，則可以用直接命令和金錢命令來加強。所以這一問題比較容易解決。難解決的是三權分立的政體問題。他們必須不變動原有的政治機構而能得到手應心的運用。這樣，他們就必須做到兩點：第一，必須使這三個機關都達到足夠反動的程度，第二，必須使其中一個能發生領導中心的作用。

現在第一點已經做到。最高法院由於其有宣告法律爲違憲而使其失效之慣例，向來就是一個重要的政治機關，而不祇是一個最高審判機關。國會在歷史上所制定的帶有改良意義的法律本來已經很少，而其中關係稍大的往往都因最高法院行使「司法否決權」而歸於無效。最高法院自始就是三個機關中最保守的一個，其保守性一向循着直線發展，直到它成名爲美國反動政治體系中的反動堡壘。國會議員人數衆多，可能偶爾通過比較護步的法律，總統有其「人」的作用，亦可能有捉摸不住的時侯，故資產階級必須有一最爲「老成持重」的機關，作爲立法和行政「幼稚」退却的最後防線。羅斯福拖着國會以立法和行政的手段實行其所謂「新政」之時，最後就碰壁在這堡壘之上。於是他就向國會堅決主張要增加法院的「新血液」，這主張又遭失敗。他的「新政」也就從此突然中止。雖然最高法院九個審判員中馬上就有一部份退休和死亡，終被羅斯福注入了一些所謂「新血液」，然亦並未發生怎樣的變化。這座堡壘至今仍然屹立。

國會議員幾乎完全是兩黨的黨員，其中重要分子也就是黨的重要分子。所以要控制國會並不困難。何況美國國會還有一個特殊的慣例，就是一切議案的決定權都操在各委員會的手中，委員會通過，或修改通過，或通過另一代替的議案而提出的，兩院一般地都照樣通過。如委員會把它擱置起來而永不提出，則議員除經全院過半數之通過外，亦無法逼使委員會將它提出討論。而這樣「殺死」的議案，竟經常都佔議案總數的四分之三以上。手操這種立法大權的委員會又照例都以最資深的議員主持，這

總的說，由兩黨歷試不爽，而始終願爲後盾的議員主持。所以加深國會的反動性不是一件難事，而且也早已做到。

總統問題比國會問題複雜，這裡暫不提它，而把它列入後面討論；這裡祇須提出：事實上目前杜魯門政府，用反動標準來測量，已不比其他兩權爲落後。

所以獨佔資本家要解決政體問題所必須做到的第一點，可說是已經實現。他們要費腦筋的，是怎樣實現另一點。三權分立的機關，雖然都已達到反動的標準，但還終究是三個獨立的機關。

三個獨立機關怎能發生法西斯一元化的效力？所以他們還必須做到第二點，就是使其中一個機關能發生領導中心的作用。這點如能做到，即與當年德國相比，亦可無甚遜色。

要做到這點，比較困難。他們不能公然將某一機關提高到領導的地位，因爲這樣就是一個變政體的問題。他們祇能選擇一個機關，使它發生實際領導的作用。最高法院當然不是這種機關。問題是國會與總統能否負起這個任務。

一部美國政治史提供了解決問題的線索。在美國史上，國會與總統之間有過四種不同的關係。第一種是國會與總統兩無高下，都不發生領導作用。第二種是國會與總統彼此爭雄，形成僵局。第三種是國會領導政治。第四種是總統領導政治。

第一，國會與總統兩無高下，都不發生領導作用。這是制憲當時的原意。華盛頓在開國之初的八年任期，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以其威望足以領導全局，而他却謙遜未遑，並不能算領導了當時的政治。在他以後，這種局面在歷史上所佔的時期，也比較多。

第二，國會與總統彼此爭雄，形成僵局。這都發生在總統爲強有力者而國會係異黨佔確定多數的

時期。威爾遜的最後兩年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羅斯福的最後兩年，由於南方民主黨的不合作，亦透露了這種徵象。這種僵持局面在歷史上並不多見，因為這兩種直接因素的巧合，並不是一件容易碰到的事情。

第三，國會領導政治（我們還不能直接就說國會領導總統）。這種局面發生之時，都是總統不能領導其黨，而國會中的多數黨却為其議員所領導。它在歷史上所佔時期比國會與總統僵持或總統領導政治的局面都多。在十九世紀中最顯著的例子就是繼林肯而為總統的瓊森。當時共和黨中的極端派完全凌駕總統之上，對戰敗了的南部美國，暢行其蹂躪壓榨的政策，終於對那倔強的總統成立彈劾，僅免判罪。在二十世紀的顯著例子，就是第一次大戰後的哈定，柯立芝和胡佛三總統。當時國會高居上風，決定政策，其中最顯著的勢力，就是所謂孤立派。

第四，總統領導政治（也與上項一樣，我們不能直接就說總統領導國會）。這種局面發生之時，都是總統為最有力者，能領導其黨，而其黨復在國會中佔多數。最顯著的例子，在十九世紀就是那來自田納西的傑克遜和領導南北戰爭的林肯；在二十世紀就是威爾遜的前六年和羅斯福的前六年（雖然這兩年已略露僵持徵象）。社會當然是決定當時政治的根本原因，所以有許多人就從時代的特殊性裡去尋找這種局面產生的原因。有人認為戰爭是其原因，尤其因為總統的權力在戰時照例擴大。也有人認為戰爭緊急時期為其原因。此外，還可能從時代裡找出其他的原因。然僅舉根本原因，並不足以說明政治上的一切變化，我們還必須尋找它的直接因素。這裡，我們不能否認充任總統的個人及其能力與個性，能在形成總統與國會的關係上發生極大的作用，因為我們並不否認人物這一偶然的因素有時能對歷史發展的過程發生或多或少的作用，而政治上重要人物的特性往往能在這裡變

成一個重要的因素。

縱觀美國全史，國會領導政治或總統領導政治都有其時，而亦各有其因素。現時獨佔資本如能造成這種局面，亦足以滿足其法西斯一元化的要求。然在目前都有困難。國會首先幾乎已爲兩黨平分，雙方力量足以互相平衡。雖然兩黨都已同樣達到了反動的標準，然兩黨之間和兩黨之內，國會與總統之間，以及國會之內和總統所領導的行政部門之內，都不斷有各種各樣的磨擦和鬥爭，包括他們所視爲最切己的人事上的磨擦和鬥爭。這是資產階級政黨和資產階級政府向來具有的特點，而由於國會的現況與總統的無能，這些磨擦和鬥爭在現政府爲尤盛。杜魯門的履歷是一個依靠地方黨老闆一手栽培的過程，其庸劣無能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所以要想由國會來領導政治或由總統來領導政治，像歷史上曾經見過的那樣，都覺條件未備。獨佔資本家既不能希望得到這種局面，而他們的要求又必須實現的，於是他們就展開他們的傑作，在把三個機關同樣地送上了反動的最前線後，他們就抓住一個機關來實現他們自己對三個機關的直接領導，這一個機關就是總統，這方法就是由獨佔資本家來挾總統以領導全局。

挾總統來領導要比挾國會來領導方便而且有效。第一，總統是一個人，國會有五百餘人。第二，行政是直接實行的，立法主要的祇是規定章程。第三，行政如果已經在前面做了，立法就不得不從後面跟上來。第四，憲法上立法、行政兩方面的牽制權也早已在發展中失去了平衡。在國會方面，關於任命國務員等，照例通過已成原則，很少例外；關於締結條約，總統用「行政協定」來規避參院手續的慣例日益擴大。而在總統方面，則對國會立法要求覆議之權仍舊是很實在的權力。這些發展已在無形中增加了總統的權威。第五，在行政方面，總統獨攬大權，對外不對任何機關負責，而對內一切行

政首長都對其負責，他們祇是他的屬僚。行政機關的政策都由他決定。美國總統是有着這樣的特殊地位，所以在威爾遜全盛時期，美國人曾說過：「世界上——一個人所操政治權力最大的是誰？」是美國總統。而當時歐洲保有專制政體的國家尚有三個之多！所以如果三權的反動程度都已足够，而總統能起領導作用，則美國政府可與希特勒看齊。所以獨佔資本家所必須做到的是佈置全局和挾持總統。

美國獨佔資本在第二次大戰中更加集中，獲利更多，力量更大；而其中又以直接間接與軍火生產有關的資本為尤甚。戰爭結束不久，經濟危機又日見迫近，而這次的威脅還比前次更加擴大，更加全面。他們應付這個威脅的辦法不是胡佛當年的聽其自然，也不是羅斯福的限制生產和增加購買力；而是大量擴軍和大量援外，藉以消耗過剩生產，擴大再生產，增加利潤，並最後發動戰爭。他們要貫徹這樣的計劃，就必須抓緊政府這部機器來實行。抓緊的方法是全面參加政府和直接控制政府。所以他們就一面將自己的代表送到國會中去，一面將手下得力的人送到行政部門中去，使他們掌握軍事、外交、財政、貿易、資源等各部、會、局，並佈置在白宮裡作總統的顧問和直接助手。將外交決策之權交付與以各軍事部門首長為重心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在國外則鞏固駐外反動軍人的地位。形成一種以軍事首長和軍人為決策中心的政治，造成一個軍財結合的政府。這樣，反動政府佈局的問題就完全解決。另外還有的是一個挾持總統的問題。

總統，就一般的意義來講，本來都是資產階級的工具，這是不待言的，所謂獨佔資本挾持總統是使總統直接、具體和全面地受其控制，聽其指揮。杜魯門是充當這種工具資格最完備的人。他在政治舞台上完全表現出沒有個性。沒有個性是全面具體受人控制聽人指揮的最必要的條件。他是庸弱無能的，這是他做領導工作的弱點，然却正是他被別人挾持着來做領導工作時的優點，因為人家既然是挾着

他來領導，要用他的就不是他的才能而是他的地位和權力。杜魯門五年餘的總統史，是一部這種工具的發展史。他自始就在執行着獨佔資本的使命。馬歇爾計劃、北大西洋公約、「北大西洋區域防禦計劃」、「軍事援助雙邊協定」、以及其他公開和秘密的種種對外侵略和對內反動的活動都是這種關係的表現。可是問題並不這樣簡單。這些獨佔資本家雖然反動和好戰都是一致的，而由於其利害關係的不同，他們所主張的策略却並不完全一致。反映到政府和軍人以及「軍事專家」的言論中來，就有軍事急進和軍事緩進等各種派別和主張的不同。杜魯門一貫地遵行着他們的總路線，執行着他們的總使命，而卻並沒有固定地完全接受某一派別的具體路線和方案。等到最後以軍火大資本為中心的最反動的獨佔資本家已經決定在東方首先發動戰爭，在戰販三代表，詹遜、布萊德雷和杜勒斯到東京與麥克阿瑟密商定計之時，杜魯門顯然已被這一派獨佔資本家所完全抓獲。其行動上的表現就是製造朝鮮內戰，直接武裝干涉和擴大朝鮮戰爭，並在台灣和我國領海進行軍事侵略。他完全接受了這一派獨佔資本家的領導，讓他們挾着他來實現法西斯一元化的要求。這樣，美國政體就充分發揮了它的特性——以三個「嚴格」分權而且相互制衡的「獨立」機關，完全原封不動，而從適應「民主」「自由」的要求變到適應法西斯獨裁的要求。接受了軍火獨佔資本家的直接控制以後的杜魯門政府就成爲一個最富有軍事冒險性的政府。這樣一個美國已經擺在中國和整個和平民主陣營的面前，需要我們去對付。

從經濟看美國政治

陳翰笙

美國帝國主義的興起，比英、法、德等帝國主義國家都晚。在南北戰爭後二十年，即一八八〇年左右，美國的企業就取得了美國南部的市場與廉價勞動力及西部新開的農場，並以廉價的小麥運到英國去換取機器，資本主義就加速發展起來。到十九世紀末年時，美國資本主義即已達到了帝國主義階段，所以就有對西班牙的戰爭，奪取了古巴、菲律賓作爲殖民地。換句話說，一八八〇時，美國的公同組織開始走向壟斷，到一九〇〇時已是向外發展，走上帝國主義的道路了。美國是一個後起的帝國主義；在現在帝國主義國家有的已經消滅，有的正在衰落的時代，表面上還像「強大」的美國也是帝國主義的一個最後的堡壘。

美國帝國主義發展起來，不過短短六十年光景。所以，它在政治、外交上的反動經驗，遠不及英國。一直到現在爲止，它還沒有像英帝國主義那樣比較多地了解殖民地的社會經濟，而在對外關係上，處處表現它的暴發戶的作風。美國帝國主義所培養出來的所謂「遠東問題專家」（即侵略遠東的專家），大都缺乏知識。譬如一九四七年四月，普林斯頓大學舉行二百周年紀念，曾召集許多學術研究會，其中之一是遠東問題研究會，參加的有三十多個教授專家。他們雖討論了關於中國各方面的問題，如中國社會結構，中國的政治、經濟等等，可是沒有一個人表現了對中國是有深刻的了解的。

美國帝國主義勢力的發展，到日本投降爲止，都是很順利的。這是由於歐洲的國際關係，造成了這種順利發展的條件。第一次大戰時，美國與英、法聯合起來，沒有費多大力氣就得到了很大的利益。

第二次大戰時，美國參加了蘇聯所領導的盟國方面，也得到了很多便宜。兩次大戰，美帝國主義都是以借款和物資支持戰爭，所出人力比較少。從一次大戰到二次大戰中間，即一九一〇至一九四〇這二十年中間，美國的富力發展得很快，從負債的國家很快地變成了放債的國家，而對外的投資也已與英國相競爭。到了二次大戰以後，英國勢力因失去了印度，失去了許多市場，更重要的是它的機器陳舊，生產力降低，因此英帝國主義的勢力愈來愈沒落了。反過來說，美國在二次大戰中，從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六的六年之中，生產力增加了差不多二倍半，所以現在美帝國主義的力量能够壓倒英帝國主義，並且能够吸收法、德、荷、比帝國主義的殘餘力量。在近東方面，美國的煤油投資已經壓倒英國；在非洲各屬地，美國的投資很快地滲入到英、法、意、比的各殖民地去；在南美，美國的資本從北部逐漸推移到南部，德國的資本固然被趕出，即是英國在南美的投資，也有半數已讓給美國。從這些方面看來，美帝國主義大踏步的發展，不過是最近十年的事。

美國財閥勢力的集中，在這十年內特別快。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內，有五十萬家光景的中小工商業被擠倒了。目前，美國全國的工業生產，都為二百五十家大公司所控制。這些財閥中的最大領袖有三個。首為洛克菲勒財團，勢力最為普遍；其次是摩根財團，對外投資不及前者；第三是新興的杜邦財團。大體講來，這三個財團聯合地領導着美國的內外政策。它們在民主、共和兩黨中都插足，摩根與杜邦兩個財團在共和黨中勢力更活躍。所以，美國的兩個政黨在本質上毫無差別，在對外實行侵略、對內壓迫與剝削美國人民的基本政策上也無歧異。

三個財團各有其特點，而又互相結合。洛克斐勒最老練，範圍最廣大，投資側重在煤油方面。美國對外投資的十分之六屬於十家大公司，而這十家中就有六家是經營煤油的。因此，洛克菲勒的資產

佈滿於南美、近東和非洲。羅斯福逝世後，洛克菲勒財團的勢力在華盛頓政府中要佔第一位。美帝國主義的外交政策當然與這個財團有密切關係。摩根財團的特色是與英國銀行界有密切關係，而在日本有大批投資，所以它的一切主張特別重視日本，尤其是極力支持麥克阿瑟。至於杜邦財團，則是一九二〇年以後才廣大發展起來的，它的資本是與納粹德國、戰前法國的資本合夥，重心是在西歐，意識上最法西斯化，並特別偏重歐洲方面。美帝國主義的內外政策大都是這三個大財團集團協調的結果。

美國中部地方和芝加哥以南的一些大城市，那裡另外有一個財團，它們的富力只是在地產、保險事業、某些輕工業及郵遞買賣公司等方面，它們的市場不在國外而在國內。過去的所謂孤立主義，是要把美帝國主義的勢力伸張到南美而不要到舊大陸去，就是這派人的主張。目前代表這個財團的人物便是塔夫脫。近年來，在美國參院中塔夫脫是代表共和黨對內政問題發言的有力人物，但是共和黨對外交問題的最有力的發言人，却是范登堡。最近，范登堡因病退休，起而代之的是杜勒斯。杜勒斯雖沒有做參議員，但被杜魯門任為總統的外交顧問，並且參加了聯合國的美國代表團。塔夫脫與杜勒斯在外交政策上是不一致的，因為杜勒斯是完全代表洛克菲勒財團的。洛克菲勒財團唯恐美國帝國主義侵略的太慢，搶不到原料市場等等，而美國中部的財團却不願意美國帝國主義在海外伸張得太快，以致加重自己所受的經濟壓力。（作者補註：我這句話的原意是中部財團不願意在歐洲大陸伸張得太快，但他們為謀自己出路起見，也願意在太平洋方面開闢他們的地盤。）因此，塔夫脫最近所發表的言論，往往反對杜魯門、芝奇遜、杜勒斯這一批人的對外侵略的方法。這反映出美國統治階級內部的分裂。

杜勒斯出身於政客世家，在少年時即與各大財閥勾結。他以律師身份加入贊助財團經營的律師集團。在一九二〇至四〇之間，他為在西歐發展美國資本勢力，出了很大力氣。在二次大戰時期，美國

一般人都覺察出他有親法西斯的傾向。他本人也知道這一點，所以隱身於救濟事業與文化機關，擔任洛克菲勒基金會主席數年。一九四八年參院的選舉中他也落選了。直到去年，杜魯門因為要保持兩黨在外交上合作的緣故，突然起用杜勒斯。在以前，兩黨外交上的合作，曾將中國問題除外。因此，共和黨方面曾藉口於杜魯門幫助蔣匪幫『不力』，而以中國問題在選舉中攻擊杜魯門政府。杜魯門起用杜勒斯的作用，便是要將中國問題也納入於兩黨合作的政策之中。以前，兩黨外交政策的合作，要在參院中表決。現在，就更加方便了，以杜勒斯的身份，隨時隨地都可以協商解決。因此，杜勒斯在今日美國反動外交政策上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

塔夫脫固然是爲他的財團利益而發言，但是也多少反映了美國中小工商業者與美國中部和西部的農業經營者對美國外交政策的觀點。甚至胡佛的意見，也多少利用了美國許多階層對於美國政府現行外交政策的不滿。美國中小工商業者很明瞭，在擴張軍備與侵略戰爭中，他們是會被擠倒的。備戰與戰時的利益，只有最大的公司能獨佔；過去的經驗，使他們害怕在最近的將來會破產。美國中部、西部甚至於南部某些地方的農業經營者，也已經感覺到戰爭對於他們的不利。過去三年中，他們希望政府津貼農產品的價格，使他們能維持以前較好的生活程度，但至今政府沒有恢復這樣的津貼。在侵略戰爭爆發後，美國少數地方的農場已感到人力的缺乏，不得不減縮生產；大多數的地方又因為農耕器具的驟然漲價及農產品價格的低落，農業經濟上處於被夾攻的地位。他們明白，在擴張軍備的過程中，農耕器具的減少是必然的，而工業品價格的突漲是難免的，所以他們都不贊成戰爭，願意美軍退出朝鮮。據目前的情形看來，這般中小工商業者及農業經營者們，反戰的情緒相當流行。但是他們現在還缺乏聯絡、組織和領導，因而還不能向壟斷的大財閥作有效的鬥爭。他們今後如能與工人階級結

合起來，那末就將逐漸在政治上表現出他們的力量。至於杜勒斯那些人們，現在用了各種宣傳方法欺騙着城市的中等社會，收買了黃色職工會，又操縱着各種退伍軍人的法西斯組織，聲勢赫赫，似乎不可一世。但是，他們的基礎是脆弱的。由於美國侵略外交的失敗，美國壟斷財閥在帝國主義集團內的地位已經受到了嚴重的打擊，它在國內的地位當然也不能不受影響。美帝國主義在國內外所遇到的困難，一定會愈來愈大。

二次大戰所造成的美國的經濟繁榮，到了一九四八年底，可以說是結束了。從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到一九四九年七月，美國的生產力下降得相當快，一般人都承認經濟恐慌要來了。杜魯門政府想盡方法避免或至少是延緩危機。所謂危機，其內在的原因，就是因為中等家庭在戰時的儲蓄陸續化光了，他們的購買力就逐漸下降了，市場上顯然出現了萎縮現象，因此引起了工商業的倒退。在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因為積極擴充軍備，並有大批的物資送往國外作為『經濟援助』，才暫時維持了工商業的局面。此外，美國政府又極力提倡住屋的大批建築和汽車的製造，而以賒賬的辦法往外推銷。買一輛車，可在兩年內分期付款；起一幢八千美金的房子，首先只要付幾百元就可以開始建築。這樣，以未來的收入享受現在的利益，才能維持一般經濟狀況，使人們不至失業。可是，連這種種辦法都不足以延緩經濟恐慌的到來。一九四九年工業生產指數比一九四三年的最高峯低了五分之一以上。去年，美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其一個目的便是延緩經濟恐慌，解決六百萬人的失業問題。美國侵略者主要的目的是以戰養戰，以侵略戰爭來擴展種種軍需工業，並彌補經濟上的破綻。果然，到去年八月的時候，失業人數的總數很快地減少，美國經濟恐慌表面上暫時緩和下來。從此可以斷定，美帝國主義準備侵略戰爭的方針是不會自己改變的，只有在強大的世界和平民主陣線和美國內部人民的力量夾攻之